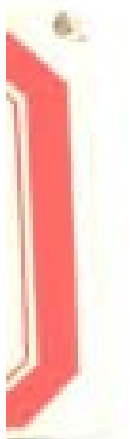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 著

〔英〕道格拉斯·安斯利 英译



6532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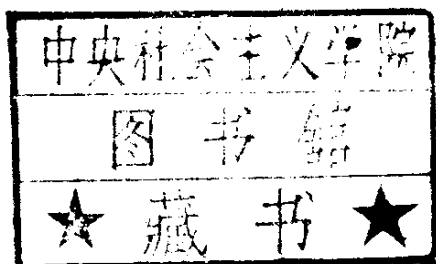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 著

〔英〕道格拉斯·安斯利 英译

傅任敢译



200020672



商务印书馆

198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 著

〔英〕道格拉斯·安斯利 英译

傅任敢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61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86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174 千

印数 6,300 册 印张 8 1/4 插页 4

定价：1.8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Benedetto Croc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Douglas Ainsli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3

根据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23年版译出

DF82/5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年10月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年)是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书初版用德文写出,1915年出版,1919年又以意大利文再版。1920年英人道格拉斯·安斯利据意大利文版译出英译本,这本中译本是据英译本转译的。

克罗齐的著述甚多。在本书之前,还撰有《作为表现科学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和《实用哲学》等书,以后他将这三本书连同本书《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合并,命名为《精神哲学》,卷次即依此排列,本书列为末卷。这四卷本的《精神哲学》表达了克罗齐的全部哲学思想,并构成他的一套哲学体系。克罗齐的历史观,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又杂以康德以及奥地利的马赫和法国柏格森的观点,带有折衷主义的特色。

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截然对立的。克罗齐站在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二十年代以后,经常发表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共产党人把批判克罗齐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就是供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分析批判之用。

译者傅任敢先生译述本书，倾注了很大心力，译文一改再改，力臻既信又达雅。遗憾的是，在排出清样时，傅先生已去世，未能由他自己再做一次校订。在此谨向傅任敢先生表示深切悼念！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6月

意大利文第一版序

构成这部论著的文章几乎全部都于1912年到1913年间在意大利各学会的会刊和意大利各论评中刊登过。由于它们是一个全盘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收集成书并不困难。这一卷用德文印行过，书名叫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①，图宾根默尔出版社1915年出版。

在用意大利文刊印成书的时候，我间或稍有修改，并增加了三篇短文，附在第一编后面，作为附录。

把这一卷书看作我的《精神哲学》的第四部分需要稍加说明；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的哲学的一个新的自成体系的部分，而应看作我的史学理论的加深与扩大，那是在第二部分即《逻辑学》的某几章中所已大体谈过的。但我对精神的方式、对这些方式的差别和统一、对它们的真正具体生活亦即发展与历史、及对历史思想亦即这种生活的自我意识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历史理解问题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我在谈完了大的范围后重新讨论史学问题并使它超出第一次所谈的范围，乃是对于整部著作所能作出的最自然的结论。“结论”的性质说明了这最后一卷的行文较之以前各卷较为紧凑和较少说教的原因，也说明了这样做是对的。

贝奈戴托·克罗齐

1916年5月于那不勒斯

^① 原文为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恩雷科·皮佐(Enrico Pizzo)译。——译者

英译者说明

作者本人说明了这卷书和《精神哲学》其他三卷的正确关系，就是，这一卷是《精神哲学》的结论。

当我翻译其他各卷时，我没有打算翻译这部论著，因为当时它还没有以现在的形状出现，事实上，一册把它当作相当于四卷杰作中最后的、晚出的一卷的外文本是由出版前三卷外的另一家书店出版的。我相信，这种不统一的情形不会妨碍书中的创造性思想的传播，我深信，细心的读者从啮合的译文中是不会放过其中的任何创造性思想的。

这一卷在版本大小上跟《逻辑学》、《实用哲学》和《美学》一样。《美学》现在绝版了，但我将从定本的意大利文第四版译出重版，内容比以前各版多得多。

这译本是从1919年出版的意大利文第二版译出的。作者在这版中在字句方面稍有修改，并略有增补。我永远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来译的。

道格拉斯·安斯利

1920年11月于伦敦雅典杂志社

目 录

第一编 史学理论

- 一 历史与编年史 1
- 二 假历史 15
- 三 作为普遍的东西的历史的历史。对“普遍史”的批判 35
- 四 “历史哲学”在观念上起源及其解体 46
- 五 历史的积极性质 62
- 六 历史的人性 71
- 七 选材与分期 83
- 八 差别(专门史)与划分 90
- 九 “自然史”与历史 99

附录

- 一 真凭实据 106
- 二 专门史的相似与相异 110
- 三 哲学和方法论 117

第二编 史学史

- 一 若干初步问题 129
- 二 希腊罗马的史学 142
- 三 中世纪的史学 158

四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	178
五 启蒙运动的史学	193
六 浪漫主义时期的史学	210
七 实证主义的史学	230
八 新的编史工作。结论	246
人名索引	251

第一编 史学^①理论

11

一 历史与编年史

—

“当代史”通常是指被视为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不论它是过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思考和精确地叙述，则“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例如，当我正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自己撰写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是我的写作思想，这种思想必然是和我的写作工作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当代”一词是恰当的，因为它和其他一切精神活动恰恰一样，是在时间之外的（没有先后之分），是与其相联系的活动“同时”形成的，它和那种活动的区别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反之，“非当代史”、“过去史”则是面对着一成历史的，因而是作为对那种历史的批判而出现的历史，不论那种历史是几千年前的还是不到

① historiography 的意思是历史的写定 (the writing of history) 或写定的历史 (written history)，所以本书的同一英译本的伦敦版书名用 historiography，而纽约版书名用 history，均可译为历史学，但主要是从编撰的角度来看历史学的。——译者

一小时前的。

- 12 但是,如果我们更细想一下,我们就看出,这种我们称之为或愿意称之为“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已形成,假如真是一种历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就也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或者(用专业历史家的话说),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理解的。至于这种历史当中杂有或掺有一份或一系列关于事实的叙述,只是表明事实较为丰富,却还没失去当前的性质:前人的叙述或判断现在本身就变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可见,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一点已由历史家们在他们的经验公式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再说过了,对于历史是生活的教师(*magister vitae*)那句老话,它纵使没有替它构成更深刻的内容,也构成了使它得以收效的原因。

- 13 我之所以想起这类历史表现形式,目的是想消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的看来似乎矛盾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不对一切历史家或某些历史家的著作兼收并蓄,并把它们用于一个抽象的人或被抽象地看待的我们自己,然后再问是什么当前兴趣使人去写或去读这类历史的,例如,叙述伯罗奔尼撒战

争或米特拉达梯斯战争的历史的当前兴趣是什么，有关墨西哥艺术或阿拉伯哲学的事件的当前兴趣是什么，那末，这个命题的正当性是容易得到证实的，是在史学著作的实际中有了大量清晰的例证的。我此刻对它们是不感兴趣的，因此，此刻对我说来，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而在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的人们的心中，它们则曾是或将是历史，当我也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并按照我的精神需要去推敲它们的时候，在我的心中，它们也曾是或将是历史。反之，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真历史的范围以内，限制在我们的思想活动所真正加以思索的历史的范围以内，我们就容易看出，这种历史和最亲历的及最当代的历史是完全等同的。当我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向我提出（说是向作为一个个人的我自己提出的，这也许是多余的，或许是不确切的）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某种阿提卡风俗习惯的问题时，那个问题跟我的生活的关系和我所从事的一点工作、或我所沉溺的爱情、或威胁我的某种危险的历史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我用同样的焦虑去考查它，我同样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决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希腊生活对我就是当前的；它诱惑我、吸引我、折磨我，就像一个人看见了敌人、看见了心爱的人、或看见了他所为之担惊受怕的心爱的儿子时的情形一样。米特拉达梯斯战争、或墨西哥艺术、或我在前面所说过的其他一切事例也都是这样、或曾是这样、或将是这样的。 14

我们论证了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之后，我们就应当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看作一种统一的关系；当然不是一种抽象意义的

同一,而是一种综合意义的统一,它既含有两个词的区别,也含有两个词的统一。因此,谈什么没有凭据的历史就如确认一事物缺乏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条件而又谈论其存在一样,都是瞎说。一种与凭据没有关系的历史是一种不能证实的历史;既然历史的真实性在于这种可证实性,既然使历史获得具体形式的叙述只有当它是对于凭据的批判性说明时(直觉与反省,意识与自动意识等等)才是历史性的叙述,那末,那种历史既无意义,又不真实,就不能作为历史而存在了。一个没有看过和欣赏过他所要去批判地描述其来历的作品的人怎样能写一本绘画史呢?一个没有叙述者所假定具有的艺术体验的人对有关的作品能有多少理解呢?没有哲学家的作品或至少是其片断,怎样能有一部哲学史呢?要有一部关于一种情操或一种风俗习惯的历史,例如关于基督教的谦逊态度或勇武的骑士精神的历史而没有重温生活的能力,或不如说,不去实际重温个人心灵中的这类特殊心境,那怎么行呢?

反之,一旦生活与思想在历史中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得到体现以后,对历史的确凿性和有用性的怀疑立刻就会烟消云散。一种我们的精神现在所产生的东西怎么能不确凿呢?解决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的知识怎么能没有用呢?

二

但是,凭证与叙述之间亦即生活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能不能被割断呢?就已经失去凭证的历史而论,或把事情说得更普遍更根本些,就其凭证已不再活在人类精神中的历史而论,答案是肯定的。而当我们说我们人人都对这一部分历史或那一部分历史依次

处于这种境地时，这一说法当中也已含有这种答案了。对我们说来，希腊绘画史大部分是没有凭证的，就像一切我们对其生活的地点、对其体验过的思想与感情、或对其所获成就的个别外貌并不确切地知道的民族的历史一样；对于那些我们并不知道其论著，或即使有其论著而且也能全部阅读其论著，但因我们缺乏完备的知识，或因我们的性情固执，有抵触，或因我们一时分心而不能理解其精神实质的文学或哲学，情形也是这样的。

在这种种情形之下，如果那种联系中断了，我们就不能把下余¹⁶的东西再叫做历史了（因为历史不是别的，而是那种联系）。从此以后，它只能像我们把人的尸体叫做人一样被叫作历史了，下余的东西并不因此就是无（甚至尸体也不是无）。如果说它是无，那就等于说那种联系是不会中断的，因为无是不真实的。那末，如果它不是无，如果它还是有，没有凭证的叙述又是什么呢？

一部根据流传至今的或当代学者的记载所写成的希腊绘画史，如果仔细加以检查，实际只是一系列附有传记性故事的画家姓名（阿波罗多洛斯，波律诺托司，杰乌克西司，阿佩列斯等等），只是一系列绘画的画题（特洛伊的焚毁，阿马松人的斗争，马拉松战役，阿基里斯，诽谤等等）^①，在流传到我们手里的描述中有关于这类题材的某些具体情节；否则，连同大体按照年代排列的人名、故事、画题、论断一道的，就是，对于这些画家及其作品的一系列程度不同的褒贬。但是不直接知道画家的作品，画家的名字就只是一些空洞的名字；故事是空洞的，画题的描绘、臧否的判断、编年的安排

^① 阿佩列斯曾将诽谤、忌妒、阴谋、欺骗、忏悔、真理、无知、迷信，拟人化作为画题。——译者

也都是空洞的,因为它们仅仅是算术性的,缺乏真实的发展;由于它缺乏应有的组成因素,所以我们就不能在思想上实现它。如果那些字面上的形式具有任何意义,那是因为我们从断片和第二手作品获得了关于古代绘画的点滴知识之故;这些第二手作品是流传下来的副本或其他艺术或诗歌中的类似作品。但是除了这种点滴知识以外,这种希腊艺术史本身只是一串空话。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希腊绘画史“没有定性的内容”,因为我们并不否认,当我们提到一个画家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某个画家,确乎想起一个雅典画家,当我们说出“战争”或“海伦”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一次战争,确乎想起一次希腊甲兵的战争,或想起一个类似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雕像中的美妇人。但是,我们对于那些名目所唤起的无数事实中的任何一件事实在思想上会是漠不关心的。由于这个原故,它们的内容是无定的,这种内容的无定性就是它们的空洞性。

一切脱离了活凭证的历史都像这些例子,都是些空洞的叙述,它们既然是空洞的,它们就是没有真实性的。说有过一个名叫波律诺托司的画家,说他在波依启列画廊画过米尔提亚戴斯的肖像,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呢?人们会告诉我们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认识他,看见过这幅画,可以证明它的存在。但是,我们应该答复说,对这个或那个见证人来说是真的,而对我们说来则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或者说(结论是一样的),它只是由于那些见证人的作证才是真的,——也就是说,是由于一种外在的理由,而真实性则永远需要内在的理由。那一命题既然不是真的(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因而就是无用的,因为一无所有时,国

王就失去了他的权力,一个问题失去了它的要素时,解决问题的有效意志和有效需要连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因此,引用那些空洞的判断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毫无用处的。生活是一种现实情况,而那种变成了空洞叙述的历史则是一种过去:它是一种无可挽回的过去,纵然不是绝对这样,总之,此刻当然是这样的。 18

剩下的是空洞的字句,而空洞的字句则是声音或代表这些声音的书写符号,它们不是靠一种思索它们的思想活动(那会使它们迅速得到充实)而是靠一种意志活动结合在一起和得以支持下来的,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不论那些字句多么空洞或半空洞,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所以,单纯的叙述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意志活动所维护的空洞字句或公式的复合物。

现在,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得以恰如其分地找到至今没有找到 的历史与编年史的真正差别。这种区别之所以一直没有被找到是因为,它通常是被当作事实的性质上的区别去寻找的,性质成了每一种区别的对象。例如,把关于个别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关于一般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关于私人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关于公共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好像一般的并不总是个别的,个别的并不总是一般的,公共的也并不总是私人的,私人的并不总是公共的一样;否则就把关于重要的事实(值得记忆的事情)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关于不重要的事实 的记载划归编年史:好像事实的重要性与我们所处的情境无关,好像对于一个被蚊子所打扰的人说来,这种小虫子的发育并不比克谢尔克谢斯的远征更为重要一样;当然,我们懂得,这类错误的区分中含有一种正当的心情,就是,把历史与编年史的区别放在有关和无关这一概念上 (一 19

般的有关,特殊的无关,大事有关,小事无关等等)。在其他惯常举出的考虑中,例如认为历史事件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而在另一方面,编年史中的则无联系,历史有逻辑的顺序而编年史则只有编年的顺序,历史深入事件的核心而编年史则限于事件的表面或外表等等,在这种考虑当中也可以看出一种正当的心情。但是,在这里,差别的性质,与其说是思索出来的,不如说是形像地表达的,而当形像表达不是作为表达思想的简单形式时,我们刚刚获得的东西瞬刻就会失去。真相是,编年史与历史之得以区别开来并非因为它们两种互相补充的历史形式,也不是因为这一种从属于那一种,而是因为它们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甚至哲学史由不懂哲学的人去写去读时,也是编年史:甚至历史也会变成我们现在倾向于把它当作编年史去读的东西,例如,当卡西诺山寺院的僧侣记载:1001年,有福的多密尼库斯到基督那里去了。1002年,今年萨拉森人越过了卡普阿城。1004年,此山大为地震所苦等等时,就是这样的;因为当他悲泣逝世的多密尼克的死去或震惊于他的故乡所遭受的自然的人类灾难,在这一系列事故中看到上帝的手时,以上那些事实对他都是当前的。但是,当同一个卡西诺山寺院的僧侣写下这些冷酷的条条,自己既不面对它们的内容,也不思索它们的内容,一心只求不使这些记忆遭到遗忘,只求把它们传给后来住到卡西诺山寺院的人们的时候,这并不妨碍那份历史采取一

种编年史的形式。

但编年史与历史之间的真正差别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别（就是说，是一种真正的真差别），这种差别的发现不仅使我们不必徒劳无益地去寻求实质性的差别（就是说，想像性的差别），而且使我们得以拒绝一种极其常见的假设——即认为编年史先于历史的假设。老文法学家马里奥·维托里诺所说的编年史，先有年代记，然后才写成历史曾被人反复引述，被人概括化，被人普遍化。但是，研究这两种作法或态度的性质从而也是研究这两种作法或态度的来历的结果表明，情形恰恰相反：先有历史，后有编年史。先有活人，后有死尸；把历史看作编年史的孩子等于认为活人应由死尸去诞生；死尸是生命的残余，犹之编年史是历史的残余一样。

三

历史脱离了活凭证并变成编年史以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只是一种声音与其他符号的复合物了。但是，凭证脱离了生活，也就像编年史一样只是一件事物，只是一种声音或其他符号的复合物了——例如，那些一度传达过法律的声音与 21 字句；那些通过一个神的形象来表达宗教情操的大理石上所刻的条纹；一堆骨骸——一度表现是一个人或一只兽。

有没有空洞的叙述和死凭证那类事物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的，因为精神之外不存在外在的事物；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当精神产生编年史并用一种意志活动牢固地掌握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再度说明，这样一种活动总是含有一种新的意识活动和思想活动的），编年史是作为空洞的叙述而存在的：意志活动把声音

从思想抽象出来，而声音的确凿性和具体性是寓于思想中的。同样，这些死凭证在它们作为一种新生活的表现时是存在的，就象无生命的死尸本身也确乎是一种生命创造的过程一样，虽则对某一特定的生命形式说来，它像是一种解体的过程，像是一种死东西。但是，像那些一度含有一种历史思想、为了纪念它们所含有过的思想而终于叫做叙述的空洞的声音一样，那些新生活的表现也仍然被视为先行的和确乎业已消失的生活的残余。

现在请注意我们是怎样通过这一连串演绎得以说明某些近代方法论者把史料分为叙述与凭证，或如人们所表述，分为传说与残余或遗物的。这种分法从经验论的角度看来是不合理的，它对

22 指出不宜在经验论中采取思辨思维这一点可能是有用的。这种分法很不合理，使人们立刻遭到一种困难，就是，无法区别想要区别的东西。一种被视为一件事物的空洞“叙述”就等于任何其他一种叫作“凭证”的东西。反之，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差别，我们又遭到一种困难，就是，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历史结构有两种不同的资料作依据（一只脚在岸上，另一只脚在河里）——就是说，我们必须求助于两种平行的事例，其中一种永远要求我们回头去查考另一种。如果我们想去决定两种资料的关系以期避免不便的平行论时，结果就是：或则把这种关系说成是这一种资料比那一种资料高级，这样一来，差别就消失了，因为高级的形式吸收了低级的形式，取消了低级的形式；否则就造出第三个词，假定高低两种形式带着一种差别在这第三个词中统一起来了，但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宣布，在那种抽象性中它们是不存在的。因此，我认为，最重经验论的方法论者不采用叙述与凭证的分法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不卷入这类细微

的争论而满足于把史料分成书面的和表现的两类或其他类似的分法。然而,在德国,德莱臣在他的价值很高的《历史主义原理》一书中利用了这类叙述与凭证、传统等等之间的差别(他具有强烈的哲学倾向),其他被我们拉丁语各国视之为驳杂的经验论者,“体系制订者”、或“学究”的其他方法论者也采用这种分法。这是由于富于德国的哲学传统之故。学究气当然是有的,它恰恰可以在那种不适用的哲学中被找到。但是,那种学究气及其遗留的矛盾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它使人心从经验论的假寐中苏醒过来,使它看到,除了被假定的事物以外,实际上还有精神的活动,在那里,一种无法调和的二元论的词被设想为是矛盾的,实则是有关系和统一的。把资料分为叙述与文献,并认为文献比叙述高级,认为必须把叙述看作一种从属的但又是无法根除的因素的想法几乎成了一种神话或寓言,它把生活与思想之间的、把文献与历史思想中的批判之间的关系用一种想像的方式表示出来。

文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就是说它们是历史综合的两种因素;处在这种地位,它们就不是和历史对立的,也不是和综合对立的,如同泉水和携桶汲水的人相对立一样,它们就是历史本身的部分,它们就在综合之中,它们是综合的组成部分并被它所组成。因此,认为史料存在于历史之外的看法也是一种应予消灭的假想,应与认为历史是编年史的反面的假想同样予以消灭。这两种错误的假想是殊途同归的。经验论者的外在意义的、当作事物一样的资料,和编年史是一样的;编年史就是一类那样的事物,不是先于历史的,而是后于历史的。指望历史由后于它的东西去产生,由外在的事物去产生,历史就会陷于窘境。由事 24

物产生的是事物,不是思想;由事物派生的历史会是一件事物,恰恰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是不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编年史与文献看来象是先于历史的,象是它的外在资料,这当中必有一个原由。人类精神保存历史的尸骸,即空洞的叙述和编年史,同一人类精神又收集过去生活的痕迹及遗迹与文献,竭力把它们不加改变地保存下来,坏了就把它恢复过来。这种保存空洞和僵死的东西的意志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也许是那种用建立陵寝和墓室的办法把人的业已消蚀的因素在迪斯神^①的疆域中保全一些时候的错觉或愚蠢吧?但是,墓室不是愚蠢和错觉;反之,它们是一种借以肯定个人所做的工作的不朽性的道德行动。他们虽然死了,但将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将活在后代的记忆中。收集死凭证与写下空洞的历史是一种替生活服务的人生活活动。它们重现过去的历史,使其更加丰富,并在我们的精神前成为“现在”的日子是会来到的。

因为,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蛮的,它们被忘记了,或很少被人重视,或被人
25 误解了,直到那被称为浪漫主义或王政复古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同情了”它们,就是说,才承认它们是它自己本身的现在兴趣。因此,目前被我们看成编年史的大段大段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会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的。

这种种再生都有它们的内在的动机,不论多少凭证或叙述都

^① 原文为 Dis, 罗马人的阴间之神,意指死后。——译者

不能使它们出现;事实上,大量收集凭证和叙述并将其放在自己跟前的就是再生的本身,没有它们,凭证和叙述就会是散漫无章的和不起作用的。除非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就是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忘掉历史的一种面貌而记住其另一面貌,那只是精神生活的节奏表现,精神的作法是:规定自己和使自己个别化,并永远把原先的规定和个别化变成不定的和非个别化的,以便作出其他更为丰饶的创造。可以说,精神无需那些被称为叙述和凭证的外在事物而重温它自己的历史;但那些外在的事物是它为自己所造出的工具,是它为那内在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迸发所作的准备活动,在这种精神迸发的过程中,叙述和文献这类外在的事物就都融化了。为了那个目的,精神维护和谨防地保存“过去的记录”。

我们每个人在笔记本中记下我们的私事的日期和其他事项(编年史)或把绸带和干花瓣放在首饰匣中(请允许我选择这类逗 26人喜欢的形象作为收集“文献”的例子)之类的日常行动由某一类叫作语文学家^①的工作人员大规模地进行着,好象是由整个社会邀请他们去做的一样。当他们收集的是证明和叙述时,他们的专称是博学家^②,当他们收集的是文献和文物时,他们就叫做考古学家和档案工作者,而保存这些东西的地方(“死东西的寂静的洁白

^① philologist, 即从事文字性历史文献的校勘、训诂和考据的学者,源出 philology。后者有人译为语言学、文字学、说文学、博言学、语言文献学或言语文字学等,兹节译为语文学。——译者

^② 略当于我们所说的考据家。——译者

的住所”)就叫做图书馆、档案室和博物馆。对于这类履行一种必要的因而是有益的和重要功用的博学家、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怎么能有任何恶感呢?事实上,人们有一种嘲笑他们和怜悯他们的倾向。他们有时候确乎给人以笑柄,因为他们天真地自信历史锁住在他们手里,当人们渴求知识的时候,他们就能把“资料”的锁打开;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存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因为,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

二 假历史

27

—

我们已经知道历史、编年史和语文学的起源了，它们是一系列的心理形式，它们虽则彼此有差别，但都应当被看成生理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真实的和合理的。但是，逻辑关系现在把我们从生理学导向了病理学，即导向了那么一些形式，它们不是形式而是变形、不是真实的而是错误的、不是合理的而是不合理的。

语文学家天真地相信，他们把历史锁在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室里（有点象《天方夜谭》中的神怪缩成轻烟形式锁在一只小瓶中一样），这种信心不是不起作用的，它引起了一种用事物、传说、文献（空洞的传说和僵死的文献）去编写历史的想法，这就产生了那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文献学历史。我说的是想法，不是实际，因为，不管怎么努力，不管怎么不辞劳苦，要用外在的事物写一部历史干脆就是不可能的。把编年史清除杂质、分成断简、重新加以组合、重新加以安排以后，它们永远还是编年史，就是说，还是空洞的叙述；把文献恢复过来、重现出来、加以描绘、加以排比，它们仍旧是文献，就是说，仍旧是无言的事物。语文性历史是从一本或多本书中倾泻出来的一本新书。这种作法在通用语中有一个恰当的名称，叫作“汇编”。这类汇编通常是很方便的，因为它们可以节省同时参考几本书的麻烦；但是它们却不包含任何历史思想。近代编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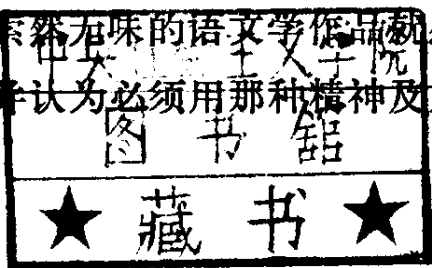
年体的语文学者怀着一种优越感去看待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昔日意大利的历史家(从马基雅弗利与圭奇阿尔狄尼直到詹诺内)。他们说,这些作家在其著作的专事叙述的部分——即编年史——中“抄录”了“资料”。但是他们自己的作法却没有两样,也不能有什么两样,因为用外在事物的“资料”来写作历史时,除了抄录资料以外是无事可作的。抄录的方式不一样,有时概括,有时更换字句,这是因为,有时是一个风格爱好问题,有时是一个文字爱好问题;抄录也是一种引语的核实工作,这种核实工作有时是为了证明忠实与准确,有时是为了使别人相信并使自己相信自己是坚实地立足于地面、立足于真实性的土壤上的,相信那是从凭证取来的叙述和引语。在我们的时代、尤其自从所谓“语文学方法”被夸大,即赋予这种方法以片面的价值以来,这种语文文献学历史家有多少啊!这类历史确乎具有一副尊严和科学的外貌,但不幸得很不充分,没有精神上的连结。归根结蒂,它们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渊博的或非常渊博的“编年史”,有时候为了查阅的目的是有用的,但是缺乏滋养及温暖人们的精神与心灵的字句。

- 29 但是,既然我们业已表明,语文性历史所提供的实际上是编年史与文献而不是历史,人们又看见我们认为编年史的编写和文献的收聚以及花费在它们上面的辛苦是最合理的,他们不免要问,我们有什么理由责备语文性历史为不合理及错误呢?要知错误的决不是事实而是伴随事实的“主张”或“观点”。在这里,它们就是前面已经被明确为专属于语文性历史的观念和主张,就是,用文献和叙述来写历史。就这种主张所主张的是历史应当越出纯编年史或纯文献的范围而论,尽管主张并未实现,它也可以说是能起合理作

用的。但是就其提出主张而自己并未实现其主张而言，这种形式的历史应该被认为是以矛盾与荒谬为其特征的。

主张既然是荒谬的，语文性历史就是没有真实性的，它象编年史一样，本身中没有真实性，而是从它所求助的根据那里去取得真实性的。有人会说，语文学是要检验根据的，它选择那些最值得信赖的根据。但是他们不提这样一事实，就是，编年史、最粗糙的编年史、最无知最轻信的编年史也同样检验和选择它所认为最值得信赖的根据，这永远是一个信赖问题（即一个别人的思想和过去的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个批判问题（即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的思想的问题），是一个逼真问题，不是一个确凿性、即真实性问题。可见语文性历史当然能是正确的 但不是真实的。它既不具有真实 30 性，它就不具有真正的历史兴趣——就是说，它并不把光辉投射到一组针对实际的和伦理的需要的事实上去；它可以漠不关心地拥有任何事项，不管那事项距离编纂者的实际的和伦理的心灵是多么遥远。因此，作为一个纯语文学者，我欣赏漠不关心的自由选择，过去半世纪的意大利史和中国秦朝的历史对我说来，价值是一样的。我将从这一种历史转向另一种历史，毫无疑问是被一定的兴趣所推动的，但那是一种超历史的兴趣，是在语文学的特殊领域中所形成的那种兴趣。

这种作法既没有真实性，也没有热情，它是语文性历史所特有的作法，它说明了为什么语文性历史家和名符其实的历史家之间经常一再出现显著的冲突。真正的历史家想要解决关键问题，看见人家要他们去应付索然无味的语文学作品就感到不耐烦，看见别人坚持那就是历史并认为必须用那种精神及方法去研究时就冒



火。这种生气与烦恼之感的最好的爆发也许可以从博林布鲁克的《论历史研究》(1751年)一书中看到,在那本书中,博学被视为名符其实的华美的无知,研究古代或原始历史的渊博的大论文最多不过被视为类似“离心的序曲”而已,那些序曲在合奏之前演出,可以帮助乐器合调,但只有没长耳朵的人才会把它们当作和声,就象只有缺乏历史感的人才会把炫耀博学和真正的历史混同起来一样。作为它们的反面,他提出一种理想,主张用一种“政治地图”来

31 供知性之用而非记忆之用,指出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和弗拉·保罗的《论圣我》是接近那种理想的著作。最后,他认为,对于真正的和活生生的历史说来,我们不应当越过十六世纪初期,不应当越过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那是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史初次出现的时候——这种体系在十八世纪初期还坚持不变。随即他就描绘那两个历史世纪的景象,不是为了猎奇家和博学者之用,而是为了政治家之用。我想,对于鼓励他如此活跃地向历史提出这类要求的正当心情是没有人愿意加以否定的。但是,博林布鲁克由于当时的文化条件之故没有也不可能进而具有关于每一种历史的死亡与再生的概念(那是一种关于“现实”和“当代”史的精确的思辨性概念),他也没有想到,他所视为无用的枯叶而扔在一边的原始野蛮史会因反对唯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之故而在半世纪之后重新鲜艳地出现,他也想不到,这种反对的主要促成者之一竟是他的祖国的一位政论家、伯克,他更想不到,在他自己的时代,在意大利的一角,这种历史已在乔巴蒂斯特·维科的精神与心灵中重新出现了。我在举过博林布鲁克这个著名的例子以后,关于实效历史家和语文文献学历史家之间的矛盾,我就不再举例了,因为它是大家所非

常熟悉的，这种冲突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眼前重新出现。我只补充一句，就是，反对“语文学者”的争论竟变得把纯粹的、单纯的语文学者包括在内，当然是可悲的（虽则完全是自然的，因为在一场斗争中，打击是不择手段的）。因为后一类可怜的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是无害的，是一些有用的小人物。如果象有时在争执的高潮中所预示的一样把他们摧毁了，那末，精神领域中的丰产力就不仅会减少，而且会完全被毁掉，我们就不得不以最大的努力来把我们的文化中的协同因素重新引进来，活象传说中的、关于法国农业在连续几年中毫无远见地捕杀无害而且有益的黄蜂以后的情形一样。

说历史不确凿和无用，这句话中无论有什么已证实的或可证实的，也是由于纯历史感对语文性历史的反对所引起的。我这样假定是因为，我们看到，甚至最激烈的反对者（弗恩蒂内尔，沃尔内，德尔菲科等人）最后也承认或要求某种形式的并非无用的或不确凿的、或并非完全无用或不完全确凿的历史，是因为，事实上，他们的全部矛头都是针对语文性历史和以根据为基础的历史的，关于这种历史，卢骚在《爱弥儿》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是唯一恰当的定义，就是，它是在许多假话中选择那较象真实的东西的技巧。

在所有其他各方面——就是，关于感觉的假设和自然主义的假设所起的作用问题——历史怀疑论象各种形式的怀疑论一样，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样被推崇为范例的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是知觉、观察和实验，即，是历史地确定了的事实；而知识的全部真实性所根据的“感觉”除了采取确认的形式，即，当它们就是历史以外，它们本身并不是知识。

但真相是,语文性历史象其他各种错误一样,不是在敌人的进攻前崩溃的,而完全是因为内部的原因才崩溃的;摧毁它的是它自己的教授们,他们认为它和生活没有联系,认为它只是一种学术练习时(请注意,许多历史都是一些学术论文,旨在训练研究、阐明和解释的技术,另有许多则是这种方向在校外的继续,是由于学校灌输的倾向所致),他们自己表现了不确凿性,使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怀疑所围绕。他们区别批判和苛求。希望阻挠历史语文学的这种自然瓦解;所以,我们发现,批判是被颂扬与被容许的,而苛求则是被责备和被禁止的。但是,这种差别是一种惯用的差别,由于这样一种差别,缺乏知识就装做爱好谦逊,力图削弱它所无力解决的对方的气势。其实苛求就是实行批判;它是批判本身,把批判分成批判性多的和批判性少的两种、并容许批判性少的而否定批判性多的,至少是过分的。没有什么“根据”是确凿的而其他是不确凿的,而是都非确凿的,不过在外表上和在想的方式上不确凿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已。谁能保证自己不受一个通常勤奋可靠的见证人因一时分心或兴奋所说的错话的影响呢?在那不勒斯的一条古老羊肠小道中还可以读到一份十六世纪的铭文,它明智地祷告上帝(历史语文学者应当每早热烈地向他祷告),求他把我们永远从诚实的人们的谎言中拯救出来。因此,当那些把批判推进到所谓苛求程度的历史家使这类工作整个一文不值时,他们就是履行了一种最有教育意义的哲学责任,因而是宜于用萨恩契兹的书名一无所知称呼他们的。我记得,当我年轻时忙于研究工作时,一位仅有些许文学知识的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他向我借了一本批判性很强,甚至真有点苛求的古代罗马史。他读完之后把书还给我的时

候说,他骄傲地相信自己已是一个“最有学问的语文学者”,因为那些语文学者得出的结论是,辛勤努力的结果使他们一无所知,而他则没有作过任何努力,仅凭天赋,达到了一无所知^①。

二

语文性历史这样自然解体的后果应当是:把自称是靠被视为外部事物的叙述与凭证之助写成的历史予以否定,把这类材料放到它们所应放的较低的地位上去,把它们看作仅是历史知识在精神的发展中规定自己和重新规定自己时的辅助。但是,如果人们觉得这样的后果不好受,虽然屡经失败,还坚持要用这种方式去写历史,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治好语文文献学历史的冷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它的内在的不确凿性而又不必改变那些假设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谬误的,只能获得谬误的解决,而表现为用情操方面的兴趣去填补思想兴趣的匮乏,用表现手法上的美学的一贯去代替这里所得不到的逻辑的一贯。这样得出的新的错误形式的历史就是诗歌性历史。

这种历史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对非常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物的充溢感情的传记和对被人憎恶的人物的尽情挖苦的传记;如渲染作者所隶属、所同情的民族的光荣而悲悯其不幸的爱国历史和对敌对的民族、自己的敌人加以恶意看待的历史;如在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理想的照耀下由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写成的、描绘“愁容满面的骑士”(如马克思所说的)即资本家的行径的普遍史和由一个反闪族的、认为犹太人到处都是人类的灾难与邪恶的根源、认为

^① 见附录一。